

# “灵性”对“诗性”的诠释

——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宗教诠释国际研讨班

(第一期) 综述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Poetics:

A Summary of Summer Institute on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 Culture

张华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Zhang Hu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英文提要]

As one dimension and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Christian theology has recently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With the increase and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broadening of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heological ethics,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ical aesthetics, which begin to have a nich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cademy, develop to an extent of breaking a new path for cultural studies, literary theoretics and especiall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Sponsored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and UB Foundation of US, International Summer Institute on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s for the first time held on Aug. 19 - 28, 2004 in Xiangfan, Hubei

Province, by the combined force from Chinese Depart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angfan College an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ological Aesthetics of Xiangfan College. The well-known scholar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ong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of US, and Helsinki University of Finland made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more than 80 young talents from tens of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lectures focus on four topics: the religious connot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umanistic spirit and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ology;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western literature, art and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 publics of theology and the issues of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poetics.

近年来, 宗教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作为一个研究维度和方向, 越来越受到人文学科的关注和重视。国际文化交流的日渐增多和加深, 世界性对话视阈的巨大拓展, 使得神学伦理学、神学诠释学和神学美学等在中国学术领域史无前例地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以及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开辟出新的理路。

2004年8月19日至28日,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一期“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宗教诠释”国际研讨班,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南伊利诺宜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数位著名学者, 与全国几十所高校的

80余位青年才俊汇聚古城襄樊，共同研讨、对话和交流，在学术研究和宗教信仰领域均产生较大反响。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宗教诠释国际研讨班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神学与人文学”系列国际合作项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拟连续举办三次暑期研讨班，此为第一次。这次研讨班得到美国UB基金会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鼎力支持，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与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共同举办。

## 一、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宗教内涵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认为，西方文化自古就具有宗教精神，而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形成的代表。他从西方文化之源、西方文化及其基督宗教蕴涵、西方文化史上宗教精神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神学体系的构建四个方面，对西方文化的宗教内涵进行了极为完整的诠释。他说，古希腊文化中对“形上”的探求，以智慧和思辨为特色，具有宗教理性精神，对内在于“己”的自我认识体现了宗教的主体精神，直面人生的史诗体现了“日神”精神，而深赋灵肉张力的悲剧则反映了“酒神”精神；古希伯来文化当中的宗教精神也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所吸收，比如追求至高一神的超越观对超验神学的影响，突出自我否定的原罪观对灵修神学的影响，强调神人立约的契约观对契约神学的影响，以及渴望复国救主的救赎观对救赎神学的影响，等等，均对西方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古罗马文化中从“神意”到“立法”的律法精神，从“自立”到“共在”的团队精神等宗教精神，既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又整合了古希伯来文化，对西方文化宗教内涵的形成也具有深刻影

响。这一切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注定了其宗教特色。卓新平认为，基督宗教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了整合和重构，在知、行、信方面达成统一，形成西方文化中强烈的基督宗教精神，主要体现在爱的精神、谦卑精神、普世精神、超越精神、先知精神、拯救精神、禁欲精神、神秘精神、律法精神等方面，并且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上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以及宽容和对话的发展轨迹，形成较为完备的西方文化神学体系。

Samuel Pearson（美国南伊利诺宜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外籍教授）以《新教精神与美国文化的宗教背景》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保罗·蒂利希关于“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形式”的观点，适用于对一切文化、一切文明的分析 and 解释，美国文化不仅不能例外，而且是对蒂利希思想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和说明。他以纪年方式，描述一个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历史事件，又以具体文学作品为例，详尽地分析了新教运动在欧洲和北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在当今北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他说，新教精神对美国的文学艺术、大学教育、日常生活等所有文化和文明领域均产生了极其强烈和巨大的影响，是美国文化中最为突出和明显的宗教背景和宗教内涵。

## 二、西方人文精神与基督教及神学的发展

“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可相辅相成，人本主义却是另一种宗教”，是罗秉祥（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宗教及哲学系主任）在题为《近代西方人文精神之宗教意涵》的演讲中推演出的重要结论。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除古希腊罗马时期之外，所谓西方“人文精神”的宗教内涵理所当然应该指向基督教。他首先对“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

主义”这些概念的内涵作了明确甄别，随后通过引述大量西文经典和详尽的个案分析对近代西方人文精神进行了宗教诠释，这使得我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宗教意涵的理解更加具体并得以进一步深化。罗秉祥认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思想当中已经饱含人文主义思想因素，是人文主义的潜伏期，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开始冒起及摸索阶段，而启蒙时期的人本主义尽管无名但却获得了实际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中，始终蕴涵着宗教的因素：从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学、人生学与神学，到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与基督教之水火难容；从随后的不再一定排斥宗教，而是寻求另一种基督教文化并发展成宗教改革，到宗教人本主义和人的国度的建立，人站起来并与上帝同等，再到启蒙时期人本主义的发扬光大，概莫能外。他说，宗教人本主义由弗兰西斯·培根创始之后，在19世纪经费尔巴哈、孔德、罗素等人之手开始成熟，发展成人的宗教，这时的人本主义就是一个尝试取代基督教的新兴宗教。20世纪形形色色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也绝不乏宗教内容，马利坦提出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其中的代表，而在21世纪，反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声音，则更使得宗教有助于促进人文精神的重建。

Miikka Ruokanen（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对当代系统神学基本观念的解读，为我们理解启蒙理性对宗教神学的对抗，以及神学在当代意义上的复萌和重建提供了现实和理论的依据。他循着从自由神学到后自由神学的发展线索所作的系统分析，恰好对罗秉祥的演讲形成后续性补充和阐释。他说，鼎盛时期持续六十余年之久的欧洲启蒙运动强调人之理性主义精神，对基督新教产生了极大影响和挑战。人类通过理性和经验两种途径获得知识，不再信仰和追求“绝对真实”或“终极存在”，而是把注意力指向通过理性追求人类经验的历史。他认为，启蒙运动时期

《圣经》是被人们看做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一样的人文经典而进行阐释和批评的，而且许多基督教的根本性教义，如上帝形而上学地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原罪说或神义论等，均遭受到启蒙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耶稣基督的形像不再是传统教义中描述的那样死而复活，而更像人类现实存在中的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和楷模。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进程相对立，后现代思想却又纲领性地解构了人的启蒙理性主义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后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和鲍德里亚等，不仅对启蒙运动以来过分信任和依赖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态度提出质疑，甚至对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都形成了解构之势。Miiikka Ruokanen 认为，按照利奥塔德和鲍德里亚的观点，“宏大叙事”的人类思想在当代不再继续有效和合法，过去或宗教地或形而上学地或意识形态地，试图将整个世界界定为一种本质存在的思维系统已不合时宜，因循着线性地、持续不断地获取客观知识和人类自由的梦想而信仰和追求共同真理的现代性，已被没有绝对尺度和标准来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的后现代性所消弭，“宏大叙事”已被今天碎片式的、暂时的、主观的和多元的真实性所取代，这些真实性或真理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律和准则，而宗教的信仰正和对其他任何一种世界观的深信一样，是其中的一种。他说，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否定，尽管并不必然将人引向宗教信仰，但这种对基督教信仰“否定之否定”的解构意识和多元的真理观念，毕竟为人类重新思考宗教与人的关系、重拾宗教信仰的精神、并将其作为多元维度之一重建新的神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自由神学和后自由神学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得以建立和发展。Miiikka Ruokanen 在演讲中还介绍了当下科学与宗教讨论的共同焦点问题以及后自由神学的五种主要形态。

### 三、西方的文学艺术思想和 生态批评理论与神学

熟谙拉丁文的奥地利学者 Leo Leeb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外籍教授）以世界公认的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为例，用流利的中文演讲，对古罗马文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诠释。他说，从历史传承关系来看，维吉尔的三部名著《牧歌》、《农事诗》和《伊尼德》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古希腊诗人的著作有所模仿，但维吉尔创造性地利用了古希腊的文学表现方式表达了当时罗马人的期望、理想和宗教，并全部用拉丁文写就，内容上比希腊诗人的著作要复杂得多。维吉尔显然不是一位基督徒，因为他生活在基督之前，在其著作中也没有直接表现犹太人传统的因素，而且，他因身受当时罗马思想的影响而继承的多神论思想还会遭遇正统基督徒的反感，但是，从维吉尔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说法与基督信仰却是不谋而合的。Leo Leeb 认为，维吉尔作品《牧歌》中对“和平之王”的期待，在基督徒看来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是一种对救世主的期待，充满着降临节的气氛；维吉尔著作中对最高之神和对命运的信仰也与后来的基督教表达有很多相似之处；维吉尔著作中反映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如弃绝男女之爱投身博爱的观念、勤劳的观念、以善服恶观念以及怜悯慈悲观念等，也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相一致，同时，《圣经》传统和维吉尔的著作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交叉点。因此，他引用哈耶克的话得出结论说，维吉尔的灵魂是一个自然地倾向于基督信仰的灵魂。

彭满圆（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在发言中以《登山宝

训》为诠释范例，演绎了《圣经》修辞诠释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他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对西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经过多年沉寂之后，在 20 世纪表现出复兴的浪潮，带动了修辞诠释学的兴起，也影响到《圣经》的研究，甚至改变了其研究方向。他透过研究《登山宝训》作为应用该理论阐释《新约·圣经》的范例，从理论上探讨了古典修辞学、《新约·圣经》与修辞学，以及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发展，又从应用上选取《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作为研究文本，分修辞段落、修辞处境、资料编排和检视评估四个步骤进行了修辞学的诠释。

耿幼壮（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则通过夏加尔的绘画与伊里亚德神学的对比，形象地诠释了“世俗”艺术中的“神圣”。他说，把夏加尔的绘画与伊里亚德的神学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两个人在不同领域中共同探讨的一个完整主题，即如何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寻找神圣的意义。事实上，作为 20 世纪伟大的艺术家的夏加尔和伟大的宗教史学家的伊里亚德之间早就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耿幼壮认为，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使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伊里亚德的判断：虽然“上帝之死”使现代艺术家和神学家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虽然对于神学家和艺术家来说，“上帝之死”首先指明了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再用传统的宗教语言表达一种宗教体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圣”已经完全在现代艺术中消失了，它只是已经变得难以识别，隐藏在那些明显“世俗”的形式、目的和含义之中。所以，通过对夏加尔的艺术创作与伊里亚德神学思想的探讨，也许可以使我们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对话中找到夏加尔的艺术甚至整个现代西方艺术的神圣意味，从而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宗教诠释问题有进一步理解。耿幼壮从夏加尔的“堕落的天使”与伊里亚德的“历史的恐怖”，夏加尔的“梦幻世



界”与伊里亚德的“宇宙宗教”，夏加尔的色彩与伊里亚德的词语三个方面展开对比。大量栩栩如生的绘画作品的展示，更增强了其演讲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刘光耀（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主任）通过文类三一与上帝三一的类比，诠释出文类的性质和诗学的任务。他认为，文学的言说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文类、文体、文本递次形成这一认知过程的三个维度，它们上下有别，先后有序，并依序存在着言说与聆听、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位格性地构成了文学言说或认知的三位一体。文本的认知对象是经验世界，文体的认知对象是先验世界，即人自身，而文类的认知对象则是存在于时间性之中的整体的人类，是人类在时间之中存在的显现。因为时间有过去、未来、现在三分，所以人在时间之中的存在也就有过去之在、现在之在、未来之在三分，作为人在时间之中存在的显现的文类也相应地分为三类，这就是文类的“三一”。刘光耀通过逻辑推论得出结论说，时间的三一性、文类的三一性与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以及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个位格是同构对应的关系，因此，诗学的根本任务就应该是探究文类三一与上帝三一的关联。

林鸿信（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有关神学与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演讲为研讨班带来绿色之风。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莫尔特曼的主张，认为西方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在于宗教危机，也就是信仰危机。他说，基督教神学主张人具有上帝的形像，而这一主张后来转而成为人想要做上帝，上帝是可以对大自然为所欲为的全能者，人也应当成为这样的大自然统治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究竟自然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可以对它为所欲为，还是人是自然界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它？林鸿信认为，这个关键问题既与对上帝的认识有关，也与对

人的认识有关。当代基督教神学应当凸显上帝的爱与参与，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并且，上帝与人以及大自然有立约关系，从这种关系来看，人应当尊重大自然同为上帝立约的对象，因此人与大自然是互相平等的伙伴。他还用这种生态神学和生态批评的观念将基督教“虚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诗歌中的“忘我”和“无我”观念作了比较，提出，“虚己”在基督教中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我们应该牺牲自己而不应剥削自然，赢得了研讨班成员的广泛兴趣。

#### 四、神学的公共性及“诗性”与 “灵性”的互释问题

神学的公共性问题或公共神学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江丕盛（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对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宗教信仰者针对公共论坛中的宗教论述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对公共理性、世俗理性将宗教排斥于公共领域和公共论坛之外的问题进行了学理的和现实的反思。他说，今天确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宗教信仰者认为，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应该清楚地区分开来，这反映出人们普遍接受了宗教和世俗、私人 and 公共之间绝对分离的观点。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接受的公共理性以及取而代之的世俗理性有别于只被某些特殊群体所接受的非公共性的或私人性的理性，宗教价值和原则因不为全体公民所共有，因而应从公共论述中被排除；另一方面，许多基督徒也站在维护神学神圣和纯洁性的立场上为这种二元分离辩护，他们要么认为这是政教分离的必然，要么认为这正是“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该撒的归于该撒”的现实反映。总之，

这样的分离似乎将两个领域封闭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从而维护各自的信念或教义。但是，江丕盛认为，来自这两方面的想法和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先验地拒绝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或公共论坛的声音，只能表明政治自由主义者正处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处境中，即通过强迫他人依从自己所持的尊重条件来保证所谓公共论坛中的文明和相互尊重；而对于基督教信仰者来说，反对这样的二元分割也有充足的神学依据：一方面，基督信仰相信上帝是一切意义与秩序的源头，是使万物由无而有的主，那么，就不应该有任何领域可以绝对置身于基督教神学所关注的整个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如果“爱上帝”与“爱邻人”确实并行，并被奉为所有诫命中最大的诫命，那么，对社会生活素质的恰当关切和对社会价值共识的积极推进就应该属于基督教会对他人的关心与服务。他引经据典地列举大量事实指出：教会历史表明，宣教活动与教会发展不仅不会与社会参与相抵触，有时还会有助于加快社会改革和更新的步伐，而宗教的私人化只能意味着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脱离关系，只会加速现代公民对宗教的离弃。江丕盛说，即便是在自由主义传统长期以来将宗教思考排斥在公共论坛之外的国家里，宗教仍对公共事务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就事实而论，宗教从未、也难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和社会价值之外。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认为，神学进入人文学领域或人文学关注神学，既是基督教思想在当代只有走向公共领域、进入公共论坛进行人文关怀才会赋有意义的结果，也是人文学科解决在当代遇到的重重困惑和种种难题的必然要求，神学和人文学在关注和追问人和世界的“意义”上抵达同一边界。他以《“诗性”的诠释与“灵性”的诠释》为题，诠释当代神学的人文价值，指出在被基督教观念所规定的西方文学和思想

传统中，哲人所倾心的“诗性道说”与诗人所神往的“灵性凭附”兴许因袭着同样的轨迹，并由此提出“灵性”可以诠释“诗性”价值并且“诗性”与“灵性”可以互释的命题。他说，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当属文学研究领域最富人文学意味的论题之一。但是，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空泛地强调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重要性上，而应对其有所推进，有所深入。他从追索由维科提出后却被湮没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诗性智慧”开始，通过对作为神学家和现代诠释学之父、却更倾向于运用“诗性的智慧”进行神学思考的施莱尔马赫思想的辨析，揭示出：“诗性”或许可以言说那“不可言说的神圣”；神学意义的更恰当诠释，或许有可能让渡给艺术的体验和情感的分享。随后，他通过对当代宗教学者伊里亚德关于“神圣的存有是借助凡俗的存有得以彰显”等观点的引述，指出“凡俗”提供的“象征语言”使得难以把握的宗教经验得到了可以把握的存在形式，并且，伊里亚德的思考还可能将我们带回一种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发生关联的最初形态，并同时透出诗学与神学的双重意味，即“象征”在文学艺术与宗教诉求之间达成的同构关系，不仅将“诗性”确认为“不可见的神圣”之惟一可见的形式，而且反过来也使“神性”真正获得了语言的载体。由此，“诗性的智慧”将哲思、神圣与文学艺术再次纳入了同一条路向。在论述“诗性”与“灵性”的互释命题时，杨慧林说，无论诗人还是哲人、诗性还是灵性、神学还是人文学，都是在追寻一定的“意义”。人文学所关注的永远都系于尘世，它所追寻的意义却又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注定是在世界之外”，所以人文学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会带有神学的关怀；与此相应，神学却是背对尘世的，但是有生命力的神学却必须回应尘世中的问题，而当代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对“元叙事”的瓦解，亦为神学进入人文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最主要入口。不过，“诗性”

的理解也并非必然通向“灵性”的价值，人文学对“意义”的追寻有时恰恰需要神学的参照，才能使一些潜在的悖论得以解释。他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海德格尔、卡尔·巴特、大卫·特雷西等人对在基督教神学和西方文学研究中均有涉及的两个关联性概念“延异”和“他者”的诠释为例，说明在神学和人文学中许多概念和论题其实是共有的，对它们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诠释可以相互呼应、相互参照、相互协调、相互延展，可以互释。他说，如果我们用一种神学的逻辑进行诗学的诠释，“延异”和“他者”会将“意义”引向一片新天地。杨慧林在演讲中还以深具思辨和逻辑性的表述风格，通过丰富严密的理论信息和论述的引证，令人信服地解读了“灵性”诠释的“诗性”价值。